

# 「下崗型」失業問題分析

● 鄭 驄

目前中國大陸的失業問題可分為「下崗型」與「非下崗型」兩種。前者是指由於對無效率的國有企業實行關停併轉等改革措施而引起的失業（或稱「下崗」），後者是指由於其他原因而引起的失業。本文在此着重分析「下崗型」失業問題。

## 原因何在？

筆者認為，當前中國大陸的「下崗型」失業問題，其原因既不是古典型失業（classical unemployment），亦不是凱恩斯型失業（keynesian unemployment），而是體制轉換型失業（transformation unemployment）。具體而言，是因為非國有企業部門淨吸收的勞動力少於國有企業部門淨釋放的勞動力所致。

經濟學中的古典學派認為，失業存在的原因是實質工資（real wage）過高，即實質工資超過了邊際勞動生產率，所以解決失業的辦法是讓實質工資下降到邊際勞動生產率水平，或者

將邊際勞動生產率提昇到實質工資水平。其中，邊際勞動生產率的提昇要依靠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革等因素，費時較長，所以，中短期內解決失業的辦法主要是讓實質工資下降。

根據定義，實質工資等於名義工資除以物價，於是有兩種途徑可使實質工資下降：(1) 名義工資不變，而讓物價上升；或者(2) 物價不變，而讓名義工資下降。在此，古典學派進一步認為第一種途徑並不可行：工人知道物價上升後，會通過勞資談判來要求提高名義工資，使名義工資與物價同步上升，結果令實質工資並未下降而是保持不變。所以，古典學派主張第二種途徑：即保持物價不變，而通過消除利益集團（包括政府和工會）對名義工資的干預，來讓名義工資能夠靈活地上下浮動。在失業的壓力下，名義工資自然會下降，勞動力市場從而回到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sup>①</sup>。

目前失業率高達11.6%的聯邦德國，其失業問題即屬古典型失業<sup>②</sup>。但就目前中國大陸而言，首先，不存在常規性的勞資談判，所以工會對名

當前中國大陸的「下崗型」失業問題，其原因既不是古典型失業，亦不是凱恩斯型失業，而是體制轉換型失業。具體而言，是因為非國有企業部門淨吸收的勞動力少於國有企業部門淨釋放的勞動力所致。

凱恩斯型失業不僅指勞動力失業，還包括資本失業。反觀當前中國大陸，事實是只有勞動力失業，而不存在資本閒置。所以，無論政府使用何種形式的擴張政策，都只會造成通貨膨脹，而絲毫無助於解決失業問題。

義工資影響甚微。其次，政府所規定的最低工資僅在每月200-300元人民幣左右，只代表了勞動力的最低生活水平 (existence wage)，而並未超過邊際勞動生產率，所以政府對實質工資的干預亦不大。由此看來，古典學派對失業的分析並不適用於「下崗型」失業問題。

另一方面，經濟學中的凱恩斯學派認為，失業存在的原因是有效需求 (effective demand) 不足。當有效需求不足時，以下兩種情況的存在會阻礙勞動力市場回到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1) 名義工資具有剛性 (wage rigidity)，即名義工資上升易，下降難；(2) 貨幣需求對利率完全彈性或者投資需求對利率完全無彈性，即當利率低到一定程度時，對貨幣的投機需求變為無限大，這時，無論貨幣供給如何增大，都不會引起投資需求的增加。凱恩斯學派主張，在第一種情況下使用擴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第二種情況下使用擴張的財政政策 (因為此時貨幣政策無用)，以達到增加有效需求的目的，其政策後果是增加就業並同時會有溫和的通貨膨脹。不難看出，凱恩斯派遵循的途徑恰與古典學派背道而馳，即保持名義工資不變，通過提高物價來降低實質工資<sup>③</sup>。

值得指出的是，凱恩斯學派對失業的分析是建立在一國之內存在大量閒置資本 (包括機器、廠房等) 的前提上的。換言之，凱恩斯型失業不僅指勞動力失業，還包括資本失業。美國在30年代大蕭條中的失業即為凱恩斯型失業<sup>④</sup>。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擴張政策 (如羅斯福總統1933-37年的「新政」) 在引起溫和通貨膨脹的同時，還能增加就業人口，而在勞動力或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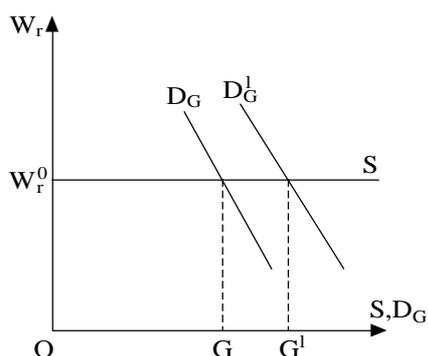
其中任一方達到充分就業之後，擴張政策就只會引起通貨膨脹，而無法繼續擴大另一方的就業水平，如美國70年代的滯脹。反觀當前中國大陸，事實是只有勞動力失業，而不存在資本閒置。所以，無論政府使用何種形式的擴張政策，都只會造成通貨膨脹，而絲毫無助於解決失業問題。由此觀之，凱恩斯學派對失業的分析亦不適用於「下崗型」失業問題。

## 問題何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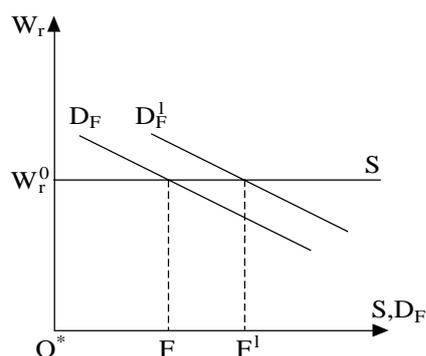
筆者認為，當前中國大陸的「下崗型」失業問題之產生，是因為非國有企業部門吸收勞動力的速度低於國有企業部門釋放勞動力的速度所致，如果我們把失業想像成水池中的積水，那麼當水流入水池的速度大於流出水池的速度時，積水就會越來越多，這正是「下崗型」失業的產生方式。

「下崗型」失業的形成過程可借助圖像來分析 (參右頁)。筆者在此將中國大陸經濟分成兩大部門：國有企業部門與非國有企業部門。前者的勞動力市場由左圖表示，後者的勞動力市場由右圖表示。

在此，縱軸為實質工資 $W_r$ ，橫軸為勞動的供量 $S$ 與需求量 $D$ ，下標 $G$ 代表國有企業部門，下標 $F$ 代表非國有企業部門。現假設中國大陸的勞動力在表示最低生活標準的工資水平 $W_r^0$ 處有無限供給，故勞動力的供給 $S$ 是一條水平線。國有企業部門的勞動力需求曲線 $D_G$ ，其斜率大於非國有企業部門的勞動力需求曲線 $D_F$ ，表明工資變動對國有企業部門勞動力需求變動的影響較小。另外，還假設物價不變。



國有企業部門



非國有企業部門

在政府不干預資本市場的情況下，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在資本市場上公平競爭，憑其所能支付的資本回報來獲得資本（包括銀行信貸、債券融資與股東投資等）。這時，國有企業僱傭的勞動力應為OG。但是，由於政府對國有企業大量提供「政策性貸款」的支持，於是把國有企業的勞動力需求曲線推向右方，使得國有企業僱傭的勞動力增加到OG<sup>1</sup>，此時非國有企業僱傭的勞動力為O<sup>\*</sup>F。因為本文不討論「非下崗型」失業問題，所以可將國有企業改革前的狀況視作完全就業狀態：

$$(1) \quad OG^1 + O^*F - L$$

L代表勞動力總量。

在國有企業改革前，表面上是完全就業狀態，實際上卻存在着「隱性失業」GG<sup>1</sup>，國有企業的改革意味着政府放棄對國有企業的支持，於是「隱性失業」就會轉化為「公開性失業」，出現數量為GG<sup>1</sup>的「下崗型」失業。

## 出路何在？

那麼，解決「下崗型」失業問題的出路何在呢？筆者認為根本之計在於取消政府對資本市場的干預，實行資

本市場的自由化，讓資本自由流向生產效率高、資本回報率高的企業（無論國有與非國有企業）。這樣，非國有企業就能擺脫以往在資本市場受到的歧視，而獲得更多的資本來擴大生產與就業，「下崗型」失業問題也就迎刃而解。

由(1)式可得：

$$(2) \quad dOG^1 + dO^*F = dL$$

消除失業意味着勞動力總量不變，於是有dL = 0。(2)式由此而變化為：

$$(3) \quad dOG^1 - dO^*F$$

(3)式表明，當非國有企業部門淨吸收的勞動力(-dO<sup>\*</sup>F)等於國有企業部門淨釋放的勞動力(dOG<sup>1</sup>)時，「下崗型」失業就會不存在了。從圖像上看，非國有企業部門獲得更多的資本，會使其勞動力需求曲線向右移動，直到FF<sup>1</sup> = GG<sup>1</sup>為止。

接下來的問題是，「下崗型」失業的數量GG<sup>1</sup>到底有多大呢？現設國有企業部門佔全國勞動總量(L)、資本總量(K)和國內生產總值GDP(Y)的比例分別為α、β和δ，於是非國有企業部門所佔的比例分別為(1-α)、(1-β)和(1-δ)。假設兩部部門具有同樣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那麼國有企業部門的生產函數可寫作：

$$(4) \quad \delta Y = (\alpha L)^\omega (\beta K)^{1-\omega}$$

解決「下崗型」失業問題的出路何在呢？筆者認為根本之計在於取消政府對資本市場的干預，實行資本市場的自由化，讓資本自由流向生產效率高、資本回報率高的企業。這樣，非國有企業就能擺脫以往在資本市場受到的歧視，而獲得更多的資本來擴大生產與就業，「下崗型」失業問題也就迎刃而解。

其勞動力的邊際產出和資本的邊際產出分別為：

$$(5) \quad \frac{\partial(\delta Y)}{\partial(\alpha L)} = \omega (\alpha L)^{\omega-1} (\beta K)^{1-\omega}$$

$$(6) \quad \frac{\partial(\delta Y)}{\partial(\beta K)} = (1-\omega) (\alpha L)^{\omega} (\beta K)^{-\omega}$$

類似地，非國有企業部門的生產函數可寫作：

$$(7) \quad (1-\delta) Y - [(1-\alpha)L]^{\omega} [(1-\beta)K]^{1-\omega}$$

其勞動力的邊際產出和資本的邊際產出分別為：

$$(8) \quad \frac{\partial[(1-\delta)Y]}{\partial[(1-\alpha)L]} = \omega [(1-\alpha)L]^{\omega-1} [(1-\beta)K]^{1-\omega}$$

$$(9) \quad \frac{\partial[(1-\delta)Y]}{\partial[(1-\beta)K]} = (1-\omega) [(1-\alpha)L]^{\omega} [(1-\beta)K]^{-\omega}$$

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生產要素的價格等於生產要素的邊際產出，所以生產要素邊際產出較高的部門所支付給生產要素的價格也較高，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力和資本就會源源不斷地從邊際產出較低的部門流向邊際產出較高的部門，直至生產要素在兩部門的邊際產出相等為止。換言之，市場均衡的條件是：(5) = (8)，而且(6) = (9)。由此可得：

$$(10) \quad \frac{\alpha}{1-\alpha} = \frac{\beta}{1-\beta} = \frac{\delta}{1-\delta}$$

並進一步可得：

$$(11) \quad \alpha = \beta = \delta$$

我們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可近似估算 $\alpha$ 、 $\beta$ 和 $\delta$ 的數值。因為「下崗型」失業主要發生在工業領域，所以估算時盡量採用工業方面的數據。到1996年底，中國大陸全國工業職工人數為6,450萬人，其中國有企業的職工人數為4,278萬人，故 $\alpha = 0.66$ 。全國工業生產總值為99,595億元人民幣，其中國有企業創造的工業生產總值為28,361億元，故 $\delta = 0.28$ ⑤。因為《中國

統計年鑒1997》中沒有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投資額的數據，故 $\beta$ 在此採用邱曉華等的結果， $\beta = 0.65$ ⑥。

我們將 $\alpha$ 、 $\beta$ 和 $\delta$ 的近似值帶入(5)式和(8)式，並進行比較，會發現國有企業部門的勞動邊際產出低於非國有企業部門的勞動力邊際產出：

$$(12) \quad \frac{(0.28) \partial Y}{(0.66) \partial L} < \frac{(0.72) \partial Y}{(0.34) \partial L}$$

將 $\alpha$ 、 $\beta$ 和 $\delta$ 的近似值帶入(6)式和(9)式，並加以比較，會發現國有企業部門的資本邊際產出亦低於非國有企業部門資本邊際產出：

$$(13) \quad \frac{(0.28) \partial Y}{(0.65) \partial K} < \frac{(0.72) \partial Y}{(0.35) \partial K}$$

(12)和(13)式表明，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中國大陸的勞動力和資本應從國有企業部門流向非國有企業部門，使得 $\alpha$ 和 $\beta$ 的值不斷下降，直到滿足(12)式為止。這裏，在 $\delta = 0.28$ 的情況下，如果政府在開放勞動力市場（即 $\alpha$ 可變）的同時依舊干預資本市場（即 $\beta$ 保持不變，仍為0.65），那麼「下崗型」失業人數 $G G^1$ 則有可能達到 $(0.66-0.28) \times 4,278 = 1,626$ 萬人。

有意思的是外資企業的狀況。1997年，外資企業的就業人員佔全國非農業勞動人口的11%，固定資產投資佔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的13%，而工業產值佔全國工業產值的14%⑦。也就是說，外資企業基本滿足(12)式，處於均衡狀況。

這裏應強調的是，解決目前「下崗型」失業問題的關鍵在於，政府在放棄對勞動力市場干預，讓勞動力可以自由從國有企業部門流出的同時，還必須放棄對資本市場的干預，讓資本亦可以自由從國有企業部門流出。否則，只有閒置勞動力，而沒有閒置資

目前有人建議通過擴大第三產業來解決「下崗型」失業問題。這裏的關鍵是如何擴大第三產業。如果仍舊由政府提供優惠貸款來擴大第三產業，那麼其後果無異於政府向國有企業提供優惠貸款。所以筆者認為，治本之計在於實行資本市場的自由化。

本，則徒令非國有企業部門「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無法擴大生產，也就無法吸收下崗人員，「下崗型」失業問題就會愈演愈烈。

目前有人建議通過擴大第三產業來解決「下崗型」失業問題。這裏的關鍵是如何擴大第三產業。如果仍舊由政府提供優惠貸



款來擴大第三產業，那麼其後果無異於政府向國有企業提供優惠貸款。所以筆者認為，治本之計在於實行資本市場的自由化。只要政府放棄干預，資本就會自動流向報酬率高的行業，增加這個行業的就業人數，而無論這行業是第三行業或其他行業。

中國大陸自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在引進外資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績。至1997年，中國大陸每生產達100元人民幣產值的工業品中，就有外資企業生產的14元產品，而且，三資企業進出口總額已佔全國進出口總額的47%<sup>⑧</sup>。但是，與此同時，中國大陸卻未能善用內資（國內資本）。究其原因，就在於政府對資本市場的干預。

中國大陸具有高達40%的儲蓄率（包括國家、企業和私人儲蓄），其中私人儲蓄佔50-60%左右<sup>⑨</sup>。然而，這些存放在國有銀行的私人儲蓄卻在政府的指令下大量流入生產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國企貸款佔銀行放款總額的70%以上<sup>⑩</sup>。結果則是貸款有借無還，有去無回。一方面，國有企業依賴政府支持，不思進取，於是虧

損不斷擴大，1996年首次出現了淨虧損<sup>⑪</sup>。另一方面，由於政府對資本市場的干預而造成的巨額銀行呆帳，已佔中國大陸GDP的20%左右<sup>⑫</sup>。長此以往，資金自然無以為繼，國家對國有企業的貸款支持也難以持續。因此，改革國有企業勢在必行。但是，政府在對國有企業實行關停併轉等改革措施的同時，更應積極推動資本市場的自由化。只有實行資本市場自由化，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下崗型」失業問題。而且長遠來看，由於邊際遞減法則（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的作用，外資不可能永遠流入，只有實行資本市場自由化，讓內資發揮最大效益，才能真正振興民族工業，保證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自去年1月1日起，取消了已實行四十多年的對國有商業銀行貸款規模的限額控制（即貸款配額），逐步推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和風險管理。這是中國大陸走向資本市場自由化的第一步，如果能夠照此方向持之以恆，將會有助於解決「下崗型」失業問題並逐漸降低大陸的金融風險。

中國大陸具有高達40%的儲蓄率，其中私人儲蓄佔50-60%左右。然而，這些存放在國有銀行的私人儲蓄卻在政府的指令下大量流入生產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國企貸款佔銀行放款總額的70%以上。結果則是貸款有借無還，有去無回。

## 註釋

① 古典學派對失業問題分析的圖像表述請見Brian Snowdon, Howard Vane and Peter Wynarczyk, *A Modern Guide to Macroeconomics* (Glos: Edward Elgar, 1996), 59; 或者Jürgen Siebke and H. Jörg Thieme, "Einkommen, Beschäftigung, Preisniveau", in Dieter Bender et al, eds., *Valens Compendium der Wirtschaftstheorie und Wirtschaftspolitik*, Band 1 (München: Valen, 1995), 149.

② 有關目前德國失業問題的分析請見Horst Siebert, *Geht den Deutschen die Arbeit aus?* (München: Bertelsman, 1994), 以及Flemming Larsen, *The United States as a Job Creation Machine: an Example for Germany?* 網址 <http://www.imf.org/external/np/speeches/1997/101097.htm>

③ 凱恩斯學派對失業問題分析的圖像表述請見註① Brian Snowdon, Howard Vane and Peter Wynarczyk, 104-105或者Jürgen Siebke and H. Jörg Thieme, 151-55.

④ 美國在1933年的失業率一度高達25%，凱恩斯認為大蕭條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市場無法自動回到完全就業狀態，需要政府實行擴張的財政政策，見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1936)；佛利民則認為大蕭條的原因在於1914年剛剛成立的美中央銀行—聯邦儲備銀行經驗不足政策失誤所致。聯邦儲備銀行在個別銀行倒閉時，不斷緊縮銀根，使得貨幣總量在1929年10月到1933年6月間下降了1/3，造成了大蕭條。見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J. 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總而觀之，大蕭條時代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不是市場本身，而是央行的通貨緊縮政策。所以，此時實行擴張政策是正確的。

⑤ 數據請見中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97》(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7)，頁412-13。

⑥ 「到1996年，國有企業資產佔全社會資產的65%以上，就業人數佔全社會就業人數的67%，固定資產投資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70%以上。」見邱曉華、杜宇：〈宏觀經濟：在改革開放中攀升〉，載翁傑明等主編：《1996-1997年中國發展狀況與趨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122。

⑦ 詹國樞、李爭平：〈1998：中國如何吸收外資〉，《經濟日報》(北京)，1998年1月6日。

⑧ 同上。李爭平：〈1998貿易走勢如何〉，《經濟日報》(北京)，1998年2月10日。

⑨ 1997年底，中國大陸全部金融機構各項存款餘額為82,400億人民幣，其中城鄉居民儲蓄存款餘額為46,300億元。《經濟日報》(北京)，1998年1月17日。

⑩ "State-sector reform, the end of a model?" *Business China* (London), 16 February 1998.

⑪ 王家寶：〈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變化與國有經濟融資渠道選擇研討會綜述〉，《經濟研究》(北京)，1997年第6期。

⑫ 據大陸央行估算，大陸銀行呆帳佔銀行貸款總額的20-25%左右，佔GDP的18%。銀行呆帳中，2%屬無法收回的貸款，8%是拖欠兩年以上未還的貸款，10-15%是拖欠尚未滿兩年的貸款。因為1996年底銀行貸款總額為61,157億元人民幣，故可推算銀行呆帳應為： $61,157 \times 0.2 = 12,231$ 億元。見"Debt Problem", *Business China*, 19 January 1998; "Heart of Darkness", *Business China*, 16 February 1998.

鄭 驄 德國曼海姆大學經濟學博士，現任德國德累斯頓銀行全球新興市場投資基金經理。